



《惜字亭下》重建中国文章审美时代新声

中国出版传媒报讯 湖南文艺出版社前不久推出著名作家胡竹峰全新散文精选集《惜字亭下》。该书重建中国文章审美的时代新声,接续中国传统精神的可贵立言,并得到李敬泽、钟叔河、韩少功、何立伟力荐;荣获三毛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人民文学散文奖。

书中既有小品文,也有大文章。是随感录,也是地方志。或精致典雅,

或简洁拙朴,或汪洋恣肆,或静水流深。乡野人家,梨园戏影,贤哲意趣,天地家国,草木虫鱼,心绪足迹正大高雅,行文结构水墨丹青。写人物灵动洒脱,谈文论艺明心见性。既雅俗共赏,又出世入世;既直击人心,又观照世界。与天地精神往来,与万千生灵呼应。传承中国文脉,书写当下精神,重返汉语之美,是接续中国文章审美传统的可贵立言,是浸淫于古却不泥古的时代新声。

《惜字亭下》胡竹峰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59.00元

让我们牵着他们的手

关键词 “新旅”精神 红色文化 青春传奇

汪政

这个世界,总有许多事物是不朽的,总有许多精神是永远闪光的,总有许多理想一旦提出便如日月悬空,值得人们永远追求。比如陶行知先生和他的教育思想。陶行之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先行者,他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中发出了“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使命号召,这是多么豪迈的壮语。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都是陶先生创办的学校与教育机构。而在南船北马交汇处的江苏淮安,陶行知先生创办了一所小学,这就是新安小学,陶行知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第二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汪达之先生。汪达之是陶行知的学生,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者,正是在汪达之的手上,在新安小学,诞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青春传奇——“新安旅行团”。

儿童文学作家韩青辰的新作《中国少年》就是以新安旅行团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新旅”,这是怎样的一群孩子!一开始,他们只是十几个十几岁的少年,雨伞、草鞋、小背包,就踏上了抗日宣传的漫漫长途。后来,不断有青少年加入进来,最多时600多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步人士的资助爱护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旅”历时17年,足迹遍布中国22个省市,他们以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日,传播革命,布新文明。他们靠放电影、写作和销售进步报刊得来的收入补贴生活,他们互相教学,个个都是小先生,真正地做到了“教学做合一”,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社会”,其教与学和改造社会得到了完美结合……难怪陶行知先生要称他们是“一群小好汉”。

这是“新旅”的故事,这是《中国少年》对历史的寻访,是作家韩青辰在纸上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冰心语)竖立的又一块纪念碑。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少年》是一部历史小说。它是一部历史之书,又是一部现实之书,准确地说,它是一部传承之书。作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当下的新安小学师生的学习与生活,组织起叙事的是他们的一个综合性主题实践活动,创作、排练一部儿童剧《新安旅行团》。为了这儿童剧,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孩子们要了解“新旅”的历史,要寻找、挖掘“新旅”的新材料,要访谈“新旅”健在的老团员,要亲自编写剧本,而那些分配了角色的小演员们更要与自己饰演的历史上的“新旅”人物原型一一对应,了解这些人物的经历,学习他们的精神,理解他们的情感,揣摩他们的性格……这是一次主题实践活动,是他们的一次艺术之旅,更是他们向“新旅”前辈学习,争做“小好汉”的过程。因此,小说的空间是开放的,并没有局限于这次活动,而是将活动与师生们的教学和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小说是新时代“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平台经济治理的创新之作

关键词 平台电商 声誉管理 大数据

李彬

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平台卖家售假、“电商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平台经济发展潜力与动能的释放。因此如何提高平台经济治理水平已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阻碍的关键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工作部署时指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虽然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来规制上述平台经济乱象,但限于政府机构对信息的掌握不完整以及规制执行起来的高昂成本,政府规制难以作为平台交易提供有效的“游戏规则”。而在制度无法发挥作用的“盲区”,声誉则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目前,鲜有研究基于平台电商声誉管理的角度探讨平台经济治理问题,汪旭晖教授的专著《平台型电商的声誉分享、声誉破坏与责任追索》(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基于平台企业与平台卖家互动视角,全面分析了平台型电商的声誉分享机制、声誉破坏机制、责任追索策略以及最终的声誉管理模式,不仅有助于丰富传统的声誉管理理论,也将为平台企业的组织管理和平台经济的宏观调控提供丰富的经验借鉴,最终为平台经济治理提供新思路。纵观全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理论贡献显著。该书界定了平台型电商声誉

的生动呈现,是新时代的“教学做合一”。社会、学校、家庭组成了教育与学习的共同体,他们不仅在纪念馆、书本上学习“新旅”精神,而且在生活中学习。不仅是学生在学习,老师与家长,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在学习,都在成长。成长不仅是少年的事,它是所有人的事,是所有人终身的事。这样的构思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对人物心灵轨迹的摹画,这种通过多种情节与细节对教育、学习与成长氛围的营造非常有意,这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更是对传承最好的文学化阐释。

写新安旅行团,彰显“新旅”精神可以有许多的写法,韩青辰选择的观点是当下。显然,在她看来,革命传统的意义不仅在当年,更在当代。红色文化的价值也不仅在于烽火岁月,还在于它的超越与永恒,在于它的精神内核,在于它在任何环境下都具有的永不褪色的活力。而对传统的学习,重要的不在于把它们作为知识,而在于将它们与现实结合起来,与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使其在现实社会中发扬光大。小说特地安排了几个形象,他们与“新旅”成员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既是现实,又是虚构,更是隐喻和象征,体现着历史走向现实的顽强的生命力。新安小学是过去的新安小学,也是现在的新安小学,小好汉们既是当年“新旅”的少年,也是当代少年行进中的精神追求与自觉塑型。传统既在过去,也在现在,更在将来。“新旅”精神是那14个少年,那600多个少年,用17年5万多公里路走出来的,也是我们新时代的少年以及未来的一代代的少年们不断谱写与增值的文化瑰宝。这深厚而鲜活,坚如磐石而又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是“中国少年”这个青春名字最好的诠释。

在我看来,《中国少年》是韩青辰的一部用心之作,也是她在艺术上有突破的作品。一方面,她对儿童长篇有了新的思考,特别是在如何处理重大主题创作上,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她又能够不忘来路,几乎调动了她此前所有的艺术积累。这样的主题给了她力量,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跨度给了她自由,既不拘泥于历史,又不刻意追求现实的完整,只是以一出戏的勾连,如中国传统写意一样点染成篇,既让两者神气贯能,又形成了饱满的张力。韩青辰在报告文学与小说创作上都有不俗的建树,《中国少年》虽为小说,但韩青辰将虚构与纪实结合在一起,作品采取双线并置的结构,让“新旅”故事与新安小学“新旅”的故事交叉向前。作品将多重话语组合在一起,有小说的虚构,有历史的纪实,有成人的书写,有儿童作文的仿写,文学、史料、笔记,各种文体、语体组成了“新旅”传承的大合唱。

看得出韩青辰对这次写作的投入,对书写对象的爱,她希望后人能牵起“新旅”的手一起向前。《中国少年》不就是一次牵手吗?我们看到,现代小好汉们的手,牵得那么深情,那么有力。

的内涵与结构,构造了平台型电商声誉管理体系,并且书中很多研究观点及结论具有较大的理论贡献,较好地证明了作者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开阔的研究视野。例如:对平台型电商声誉分享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提出平台型电商声誉是通过声誉转移路径和声誉溢出路径而实现的,并最终对平台卖家绩效产生有利影响,为后续平台型电商声誉管理策略的研究提供了证据,也对现有平台经济理论和声誉理论进行了整合性创新;该书基于“平台企业—平台卖家—平台买家”三元互动视角,按照交易发生顺序将平台企业管理策略分为事前控制策略与事后救济策略,探讨了平台企业管理策略对平台企业声誉的影响,率先对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给予了理论层面的界定,在丰富了企业管理策略与声誉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推进了声誉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是论据翔实。该书收集丰富的数据,采用多组实验,验证了该书所提出的平台型电商的声誉分享、声誉破坏与责任追索的理论框架,分析过程采用图表的方式呈现,逻辑严密且较易理解,充分论证了该书研究内容的科学性。

三是管理建议可操作性强。该书针对规制平台卖家违规行为、激励平台卖家合规行为、提高平台卖家责任意识等所提出的平台企业管理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于各平台企业收取合理的声誉租金、采取适度的规制策略、建立良好的平台型电商声誉,最终实现平台型电商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最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综上,该专著在理论层面上搭建起平台型电商声誉分享、声誉破坏与责任追索的框架体系,可以在实践过程中有效提高平台型电商的自治水平,是平台经济治理研究的一部力作。



《中国少年》韩青辰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5月版/28.00元

润物无声的亲子教育诗

关键词 儿童文学 亲子教育 人道主义

徐鲁

冰心老人把博大的爱心献给了一代代小读者,她生前曾一再寄语儿童文学作家们:从事儿童文学,“必须拥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儿童文学,应该给世界爱与尊重。”“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这些教导,被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奉若圭臬。

梁晓声先生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富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入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晓声近些年能俯下身来,为小孩子写了不少童话故事,也显示了这位“兴风狂啸者”内心深处的母性与童心未泯的一面。或者说,他的儿童故事创作,也是他人道主义情怀的一部分。

“梁晓声亲子半小时绘本”是他的儿童文学新作。与2019年出版的“梁晓声童话”系列相比,该绘本更偏向低年龄段的幼儿,是一些温馨的、饶有童趣的“亲子故事”。

亲子故事,通常是由爸爸妈妈讲给幼小的孩子听的。这意味着,写故事必须要用小孩子听得懂的“浅语”;故事线条应该越清晰、简单、明快越好,不必旁逸斜出;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上,最好还能带有一点“复沓”和“接龙”的趣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轱辘体”,这是一种既符合小孩子阅读和期待心理、也是绘本故事里最常见的一种饶有“翻页”带来的惊喜和童趣的叙事方式;如果能有一些简单适当的亲子对话,特别是对儿童生活日常所见的小动物叫声的模仿等元素,那就更增添了让小孩子不知不觉地“参与”到故事里、达成亲子互动效果的乐趣。

用这些不成文的“标准”来看待晓声的这套亲子故事绘本,我觉得,《一天上午的声音》是写得最为完美、几乎无可挑剔的一本,亲子趣味性、儿童教育性、浅语艺术性,三者水乳交融。

浅显的故事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浸润着作者的苦心孤诣。所谓幼儿文学的“文学性”,就应该是这样,你看不见它,但它们又分明存在,都融化在了饶



“梁晓声亲子半小时绘本”系列/梁晓声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2年3月版/168.00元(5册/套)

有童趣的浅语故事细节里。这个创作例子,也可以给儿童文学同行们带来一点思考: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应该是一位文学修养深厚、心地仁爱纯净、语言干净精妙的文学家,而不是“降格以求”。

这些童趣盎然的故事里,都蕴含着作者润物无声的“文心”:那就是要用一种健康、健全、清晰和明亮的价值观,对当下“新孩子”的人格养成,起到润泽、引导与塑造的作用。这与晓声一直在呼吁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要具有塑造一代“新人”的理想和责任,是一脉相承的。

晓声给小孩子们讲故事,是很懂得小孩子心理的,所以,故事里会出现一些看似“打岔”的语言,例如:“什么?已经讲过了?让我回忆一下,对对,的确讲过了,但那次讲的是一只小黑兔的故事呀!——它的朋友们起先叫它‘黑骏马’,后来叫它‘葵花王子’是吧?”这种故意的“打岔”,让作家自己也参与到故事里,既增强了讲故事的“现场感”和“亲和力”,其实也是在鼓励和满足小孩子的好奇心和渴望参与的心理。

晓声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甚深。俄罗斯文学界都知道一根“绿树枝”(有的译成“小绿棍”)的故事。列夫·托尔斯泰5岁时,他的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世界上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写在一根绿树枝上,就埋在他家庄园附近的田野上。只要谁找到了这根绿树枝,世界上就不再贫穷、疾病和仇恨了。这个绿树枝的故事,让幼小的托尔斯泰从此心驰神往。寻找那根神奇的绿树枝,不仅成了托尔斯泰童年时最喜欢的游戏,也成了他一生的使命。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毕生都在寻找那根能让人摆脱贫穷、疾病和仇恨的绿树枝。这个故事本身就很美,也很单纯,非常符合幼儿的好奇心理,但是故事的内涵和情怀又很博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就是在小孩子的幼年记忆里播撒绿树枝的人。我们所写的每一篇文学作品,如果能像小托尔斯泰心目中的绿树枝一样,让孩子们心驰神往,愿意付出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它,那这篇作品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价值。我感觉,晓声为孩子们写故事,也像是在童心的田野上埋下一根根绿树枝。

“树文学”的出现与内涵探寻

关键词 绿色 少女文学 植物性思维

班马

作家韦伶对于“树文学”的写作,并不是明确设定和设计的文学方向,而是有着一种从不自觉到逐步获得的演进过程。在韦伶的本色作家书写行中,自带一条走向“树”或回到“树”的必然路径,也存在着作家个人和外界“符号”定位的强化与催化作用。

1989年~1990年对“稳定型”少女的审美投射。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一书中,韦伶有过这样的表达:同男孩仍处于幼稚“动”的状态相对应的,开始走向少女的大女孩却在趋向能给予她们“稳定感”的存在;除了文学人物的“男人”类型倾向之外,还有着自然界的那些以风雨不动、苍劲可靠为精神依托的天地“植物”。

在小说集《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韦伶、班马合集)的自序中,韦伶对于属于“大西南的墨绿”的文学色彩,以及“林中”之“幽影”“小绿人”的称谓,都已认同。

1992年,韦伶表达了有关女性的“植物性思维”的性向层面。

1994年,韦伶在《走神女孩》中,完整表达了浓重的“植物”与“树”的意象。文学投射和艺术意象都已十分明确,但更多的还是泛自然的女性自然主义者。

1994年,在首次以“绿人”命名并创刊的《绿人儿童画报》中,作为文字主编的韦伶主持“绿人姐姐”信箱,并以“绿人”“绿头发”的装扮出现;属于对于一种“社会身份”的宣示,或是对一种“人格身份”的自认。

1997年韦伶幻想文学《幽秘花园》出版,让其回到了精神属地——大西南山林和“精神之树”所在的红岩村童年之地。

关于1992年~2001年间的“反城市反工业化”作品争议,韦伶较浓重的“返回自然”“山林之野”和“反城市水泥森林”的作品及观念,在被质疑和讨论的阶段,获得了当时《少年文艺》主编沈颀支持。这一来自文学媒体的坚定支持,对于韦伶坚守自我文学方向,起到重要作用。自1992年发表短篇幻想小说《公路》,直到2001年,可以看到韦伶的某种反城市化、反工业化的文学情绪显然处于发展和加重之

中;她当时应该并未接触到“女性生态主义”,但契合这种将“女性”文化属性与“绿色”“生态”自然属性天然合一的观念。从作家论和文艺创作心理的角度,可看到某种“挚念”,及其由此而确立起了创作“旗帜”。或可说立场更坚定,信念已固化。“绿人”也已增加了动词的含义;以“绿”创人,以“绿”化人。

2003年创立“少女作家班”,韦伶主编了一系列少女作家班作品集,得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支持,出版《月亮女孩的花园》《树的屋子》《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等图书。

2007年开始的“女书”文化符号让韦伶的写作个性进一步发展。韦伶对湖南的“女书”文化现象早在写作《走神女孩》一书之时即已特别关注,直至2007年才得以开车抵达这一位于湘南的“女书村”;之后,则数度进行了精神朝圣般的拜访和交流,并将少女作家班同样地带往此地。这一文化行为,很明显地具有“文化归属”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含义。这种“女书”行为,在我看来既可以理解“她”的独立和自立,但也具有一种“她”的区隔性;而这可能加重韦伶对“她”与“幽”的进一步联结;有如自成一体“的女书”,与“幽然独在”的“山中大树”的那种“独幽”方式的处世取向。通过“女书”已使作家对“自然”和“自在”(而不是“社会”和“公共”)加深仪式般的信仰。

2013年,在广州举行的《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丛书发布暨少女文学研讨会上,“少女文学”成为一种话语景象。

韦伶的绿色写作及其“树文学”的演进,近10年来直接指向了对“树”“树屋”以及“林中家园”的关注。在《绿人家园》中,将“虚构”的树文学同“非虚构”的树屋现场和树上生活场景相叠合;也将“作家写作行为”同“作品文本”以及“作品描写”“实境呈现”构成对接。

以上可以看出韦伶“树文学”现象的发生、渐进、逐步演化成形的发展路径。韦伶童年“少女树”的情结,对女性文化“植物性思维”的主张,超越了一切刻意的设计,达到了“从树到树”的文学彼岸的自渡,也体现了作家对“树”的自我获得。



“绿人姐姐的绿色传奇系列”韦伶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4月版
绿人家园/38.00元
幽秘花园/36.00元
绿人姐姐传奇/50.00元
女孩的神秘信物/42.00元
山鬼之谜/38.00元